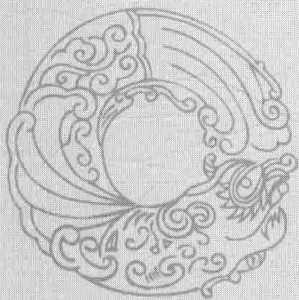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遗产学术丛书

明清时期关中士人 生存境遇与文学生态

常 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遗产学术丛书

明清时期关中士人 生存境遇与文学生态

常 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时期关中士人生存境遇与文学生态/常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203 - 0483 - 2

I. ①明… II. ①常… III. ①士—研究—关中—明清时代
IV. ①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475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25
插 页 2
字 数 378 千字
定 价 10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项目编号：11XZW008）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文学实力的消长与文学的地域性	11
第一节 明清关中文学版图	11
一 明清关中的经济与文运	12
二 文学力量的倾斜	16
三 文学流派中的关中诗派	23
第二节 地域性与文学风格	27
一 文学地域性的文化学考察	27
二 关中士人文学的地域意识	31
三 汉唐气象的遗韵	35
第三节 明清关中文学生态	40
一 本地文学环境的封闭性	40
二 文学的风气与接受	43
三 文学体裁的传统性	47
四 “秦风”与“婉丽清雅”	50
第四节 “西北之音”与“东南之音”	54
一 复古运动中的“南”“北”问题	54
二 东南文人的地域优越感	57
三 服膺“西北之音”的东南文人	62
四 “西北之音”与东南文学的论争	65
第五节 “西北之文”与河洛文学的互动	69
一 明清关中与河洛文学的同质性	70

二 复古运动中的关中士人与河洛士人	73
三 李梦阳与何景明的论争	76
四 李梦阳家居时与河洛的文学团体	78

第二章 地域文学发展的文化土壤

82

第一节 科举与文学风气	82
一 科举与士人的身份	82
二 关中士人的科举状态	86
三 八股文与文学	93
第二节 基层书院与文学	98
一 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复兴	98
二 书院的学术	102
三 书院与科举	105
四 书院与文人之风气	109
第三节 刻书、藏书与文学	112
一 经济、阅读与刻书的宏观考察	112
二 明清关中的刻书状况	114
三 官宦士人与民间士人作品的刊刻形式	121
四 刻书与文学作品的传播	126
第四节 商业活动与文学	129
一 明清关中的商业与民俗状况	129
二 士人对待商业的态度	136
三 士人与商人的交往	139
四 作品的种类、风格与商业的关系	141
第五节 文学领袖对士人的奖掖	144
一 明清与关中士人相关的文学领袖	145
二 关中士人与文学领袖的交往	149
三 文学领袖对关中文人的延誉与奖掖	152
第六节 地方官员与文学	156
一 振兴文学的自觉意识	156
二 文学人才的发掘与培养	160

三 地方官员与地方士人的交往	164
第三章 士人活动的空间与文学	169
第一节 结社与文学	169
一 明清的文学结社	170
二 关中士人京城结社与文学活动	173
三 明清关中的结社考察	177
四 寓居江南关中士人的结社	181
第二节 宴集与文学	184
一 士人宴集的社会背景	184
二 宴集与文学创作的契机	186
三 宴集与文学创作形式	189
四 宴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价值	191
第三节 流寓与文学	194
一 关中士人的流寓类型	194
二 关中士人流寓的心境	197
三 流寓过程的文学活动	200
第四节 逆旅与文学	203
一 逆旅中的经济与居住问题	203
二 逆旅中的孤寂与贫病	206
三 逆旅中的文学意象	208
四 逆旅中的现实主义文学	211
第四章 士人的身份与文学	215
第一节 明清关中士人家世与文学	215
一 明清关中文学家家世分布	216
二 明清关中的文学家族	223
三 境遇的变迁与文学	230
第二节 致仕之后的境况与文学	233
一 致仕后的文学活动	233
二 黜落官员的心态与诗文	237

三	致仕后的山水与村居文学·····	240
四	归田文人的交游·····	243
第三节	游幕与文学·····	248
一	清初关中文人游幕的背景·····	249
二	游幕文人的境遇·····	254
三	幕府中的文学活动·····	257
第四节	遗民与文学·····	261
一	易代之际关中遗民的出处·····	261
二	遗民文学作品的历史意识·····	264
三	遗民文学作品的逃世思想·····	269
四	遗民与山水田园文学·····	276
第五章	公共事件与文学·····	279
第一节	历史的际会与文学力量的崛起·····	279
一	文学复古运动前夕的文学·····	280
二	关中士人的性格与担当意识·····	284
三	“复古运动”中关中士人及其后继者·····	287
第二节	“刘瑾事件”与关中文学的命运·····	290
一	刘瑾与李东阳的关系·····	291
二	关中士人与刘瑾的关系·····	293
三	“刘瑾事件”的实质·····	296
四	政治生命与文学生命·····	300
第三节	博学鸿词科与文学·····	302
一	清初的文治政策与士风、文风的转变·····	302
二	被征召中的关中士人及其态度·····	304
三	士人在京城的文学活动·····	309
四	对关中士风、文学声誉的影响·····	311
第六章	与文学相关的其他文化形式·····	314
第一节	关中理学与文学·····	314
一	传统关学学者的文学态度·····	315

二	亦理亦文的士人传统	318
三	文与道、文与情	320
四	对士风与文风的批判与反思	326
第二节	明代关中修志与文学	328
一	明清关中的修史之风	328
二	地方志的文学色彩	332
三	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与艺文志	334
四	明代关中士人修志的社会影响	336
第三节	明清关中的戏曲与演剧	339
一	演剧的土壤与条件	339
二	明代关中演剧的地位	342
三	关中演剧的形式	344
四	关中曲家与南派曲家的比较	348
参考文献		352
后记		377

绪 论

当代文学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文学的批评都有别于传统，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系统论的研究方法是诸多方法之一，它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选择了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以期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宏观的总体把握。

生态学是以生命现象的复杂性为对象，从关系论出发，研究生命自身的整体性，研究生命与其环境的整体性，生态学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关系论、有机论、整体论^①。生态学是德国动物学家赫克尔于1866年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中首次提出的，他表示生物同有机或无机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汉斯·萨克塞指出“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②。文学生态是文学生态学隐喻，即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观察、研究和解释文学以及文学与“文学环境”之间的关系^③。“文学生态”概念的内涵可以这样表述：它是把文学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即把文学自身的构成因素与影响文学的诸多因素视为一个系统内部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制衡、衍生循环，共同构成一个“文学生态链”，用这个生态链来考察与判断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作家生平与创作、读者接受与批评等诸多方面。本书拟将文学生态链分为文学的政治生态、文学的经济生态、文学的文化生态、文

① 余晓明：《文学生态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第18页。

② [德] 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2页。

③ 余晓明：《文学生态学研究》，第15页（在后文注释中，同一文献重复出现，现代作品只标明作者、著作名和页码；古籍只标明作者、析出文献、原著及卷数，有页码的影印本亦标出页码）。

学的学术生态等方面来进行研究,以期揭示明清关中文学发展的复杂性。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生态学研究视角的确立必须立足于系统论,需要研究者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诸多问题,要求研究者融会贯通自然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学、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宗教学、伦理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建立起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跨学科研究框架,找准文学与地理的契合点,从空间维度重新审视研究对象,包括揭示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物质或非物质的文化要素对古代作家的物质生活环境、基本生存状态、心理结构、性格气质、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以及创作能力的综合影响。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与地域差异现象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古代文学发展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以及文学文本所包蕴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内涵^①。

就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任何时期的文学及其表现仅仅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片段,文学演变和发展的纵向连续和横向的空间分布共同构成整体的文学时空图景,而“版图”概念的引进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版图的形成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在特定的时期又具有相对的空间稳定性。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非常重视版图,古代版图之“版”意为户籍,《周礼·夏官·司土》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为户籍之意。版图之“图”意为地图。现代人将版与图组合为版图,即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同时又可分指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而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文学图景^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的出现和西方研究方法逐渐引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运用人文地理学相关理论把握古代文学的地

① 周晓琳:《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②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论第13页。

域特色逐渐成为一个热点，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一文，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文学地理学”，将其性质和内涵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①。文学地理学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克服中国传统文学研究重文献轻方法，或研究方法单一的不足，充分认识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必要性和趋势；其次在于从文学发展的横向和纵向着手，重视影响文学发展的各种因素，重新阐释与领悟文学的内在意义，进而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范式，在方法论上能够和国际文学研究接轨和对话。

区域文化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代地域文化研究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较传统研究都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地域文化的构成包括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地理因素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是区域文化的浅层次方面，而包括历史沿革、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语言、信仰等。内在的人文因素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可以这样说，地域文化应该是由现实空间的自然条件和绵延于这个空间的历史文化积淀构成的，前者是看得见的、具体的、物质性的，后者则是抽象的、精神性的^②。文学与地域关系的研究，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系统工程，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观照视野扩大之后，地域与家族文学、地域与民俗特征、地域与审美趣味、地域与文学流派以及地域与政治、地域与民族、地域与经济等均已成为当代学者的探讨对象，由此派生出不同系列的诸多子课题，从而带来了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内容的丰富性与多样性^③。明清关中文学遥接《诗经》中“秦风”的传统，续接“汉唐雄风”，历经千余年的演变形成特色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些特征积淀于关中士人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中，成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七子”树帜立复古旗的主要内容，同时对明清文学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文艺报》2006年6月1日。

② 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③ 周晓琳：《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政治与文学

相较于文化，文学的形式更为规范和精致，其产生与发展过程更为复杂，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无论是《诗源》中的诗歌，还是《诗经》中的诗歌，都反映了这一态势，而其中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文心雕龙》就指出“时序”“通变”影响到文学题材和形式。

政治总是和利益集团的概念纠缠在一起（广义的政治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其内部充满着相互合纵连横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为统治的合法性寻找依据，往往会借助外部势力或文化因素，此时的文学往往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他们通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文学的话语系统和话语权，往往拒斥文学的复杂性，总想把文学简化为一种实用性的工具，或者变为建构自身的砖瓦，或者作为解构他人的工具。而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文学家有时往往会把政治视为权力集团对自己进行压制的怪兽利维坦，于是在政治家和文学家之间也往往会进行一种“平行游戏”，他们都假设没有看到对方，对方也不是游戏的一部分^①。

当代中国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学的影响，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文化/文学社会学形成于19世纪中叶，它主要从社会因素角度切入文化/文艺研究，即研究文学的社会起源，文学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变迁，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方式等领域。文学社会学主要是把文学的这种社会过程及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视为其研究重点，如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艺术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和《文学体制与现代化》，美国学者杰弗里·威廉斯的《文学体制》，等等，他们结合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分别从社会、政治等因素来探讨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以及再生产。其中布迪厄的“文学场”观念近年来颇受关注，他通过探寻文学价值与意义得以形成的社会机制，认为“文学场”也就是文学的产生机制，艺术是体制构建的结果。他还描述和探讨了限制与规约艺术生产的体制力

^① 余晓明：《文学生态学研究》，第29页。

量,如批评家、艺术史家、出版商、学院、沙龙、艺术主管机构、行政机构以及国家与政党的文学观念、文学政策、审查制度等。直接为文化体制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具有价值的参考理论和方法。埃斯卡尔皮认为作家、书籍和读者是一个循环系统,并把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等文艺社会过程作为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另外,西方学界以“文化/文学体制/制度”研究推进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如法国学者斯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丹纳的《艺术哲学》、罗贝尔·埃斯卡尔皮的《文学社会学》、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俄国学者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德国学者阿尔方斯·西尔伯曼的《文学社会学引论》、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美国学者约翰·R.霍尔和玛丽·乔·尼兹的《文化社会学》等成果关注社会、政治、权力等因素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影响。这些方法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式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促进了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中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本书就明清关中文学发展中诸多政治事件,如弘治、正德的右文政策、刘瑾事件,康熙朝的博学鸿词科等政治事件对文学的影响及士人所作出的反应进行研究,以期说明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解释明清关中文学兴衰的政治原因。

经济与文学

文学的发展与繁荣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外部环境诸因素中,特定时空内的生产方式及经济发展水平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和制约作家的写作行为与作品风格。区域性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区域之间不同的经济类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从宏观层面进行考察,不同的地域环境自然地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经由人们的生产方式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经济形态,为人类提供不同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区域经济通常以不同的形式,通过影响区域政治地位、区域中主要政治人物来调控和影响作家的行为方式及其文学创作。从微观角度分析,经济的区域性特点对文学创作领域的辐射,绝非仅限于为作家的生活提供物质保障和生活场景,为作家提供文学创作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文学实力的消长。文学创作的繁盛中心通常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良好的经济环境为士人提供良好的

生活与成长环境（其中包括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决定士人的空间分布与流动取向的基本状态，甚至使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空间的走向产生巨大变化。同时，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直接影响到文学的传播方式与传播范围，一般而言，经济发达的地区图书的刊刻数量和传播速度较经济落后地区要好得多，这更加剧了由于经济状况不同而导致的文学实力的差距。中国历代古都虽不是出产作家最多的地方，但这些地方往往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此也成为文学家群居之地。从历史上考察，首都作为一国政治活动的神经中枢，地址的选择必须考虑自然地理和政治经济地理条件，我国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六大古都大致经历了自西向东、由南向北的迁移过程，其空间演变总体上体现了因利乘便以及随经济开发和政治斗争形势变化而变迁的规律^①，关中文学自中古以来至明清的变迁正体现出这一情况。文学地缘性的基本因素包括空间的地域和活动于其间的人，明清文人分布的地域不平衡倾向是文学地缘格局的一个重要前提，由于政治、文化、经济三大因素的差异导致各地区的文学差异几乎贯串了六百年封建王朝的漫长历史，从而产生了一部非平衡发展的、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学史，明清关中文学的发展，同样暗合了这一趋势。

士人的身份与文学

士人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士人群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中起到“灵魂”的作用。一般而言，士人有民间和官宦之分，其中官宦阶层的士人具有集官员、作家、学者于一身的综合特征，他们文学创作的空间存在公私之分，不同的身份，表现出不同的文学态度，其文学作品由于这一区分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官方场合（政治场合），他们的主导身份是官员；在公共场合（社交场合），他们的主导身份是社会名流。在这一身份主导下，他们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庙堂性的特征；在私人场合，他们的主导身份是作家、是学者、是家庭成员，其文学作品的内容更加注重自身生活私人化的方面，文学作品的形式相较庙堂文化也略显随意。当然士人身份的这种区分是相对

^① 周晓琳、刘玉平：《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的，随着政治事件和时间的流逝，这种民间和官宦阶层的区分往往会流转，其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另外，士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受士人身份影响的变化同样是相对的，在官方场合中，官员行为并非是纯然的政治行为，也有大量的文学创作，只不过在某些既定的场景下，留给作家的政治空间，要大于文学空间；同理，在私人场合，也不只是风花雪月的吟咏，同样有一些说教、论理、颂美的成分^①。

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士人群体的流动随时都在改变，并最终决定着中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决定着文学区域系统运动的方向与节律。作为一个流动着的群体，士人的社会交往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态。关于士人的社会交往，从活动内容来看，应该包括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往等活动。士人作为一个社会等级或阶层，其交往大体有群体交往与个体交往两种形式。社会生活中的交往行为，往往既表现为与其他阶层的交往行为，又表现为士人之间结成各种团体，诸如党、社等形式；士人的个体交往是指士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发生的各种有意识的、主动的社会联系，如交游、讲学等，其虽然属于个体行为，但由于士人的文化属性使得个人行为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社会文化烙印，所以个体行为也能充分地反映士人群体的特质，而且能生动地展示士人这一群体的精神面貌^②。士人这种空间的流动性暗示他们在不同场景下创作身份的内部整合，这种整合使得聚合在他们身上的文学元素自然不同，这些元素既有利于作家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丰富自己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手法，也有利于诸多文学形态之间的交流。明清关中文学发展实力的消长，在某种程度上讲，士人身份的变迁是直接的诱因。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关中士人步入郎署，为纠正以台阁体为代表的“萎靡”文风提供了平台，关中士人走到了文坛的中心位置。相反，由于刘瑾事件，涉事关中大部分士人的身份由仕宦阶层变为平民，文坛的中心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导致关中文学实力的衰落。同时通过考察发现，明清关中文学的家族化现象是士人身份仕宦化的结果，而清代文学实力的整体

① 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 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第3—4页。

不彰，主要是缺乏处于文坛中心位置的仕宦阶层，无法产生名人文学的效应，这种身份的置换对明清关中文学的影响十分明显。

明清关中^①文学的地域性

文学与地域有着“血缘”关系，同一地域文学家有着相近的审美情趣和创作风格，进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学流派。美国人类学家 C. 恩伯曾说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人们对一定环境的反应却有着严密的一致性，这是因为他们共同享有相同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这些便构成文化。”^② C. 恩伯的这种文化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地域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而地域文学是地域文化的一个表现方面。明清文学发展特点之一就是地域文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文学格局，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明清文化重心的下移及地域文化蓬勃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地域文学有着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诗经》中的《国风》已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文学特征，在以后文学发展过程中，这一特征更为明显。秦汉的文人对人、地关系，地域与文学的关系都有较为系统的论述，诸如《孔子家语》、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曹丕的《典论·论文》等都述及这一问题，这一时期阐述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文学风格的地域性特征方面。创作者的地域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毋庸置疑，但作为一种理论尚未明确提出，这一传统直至宋代。祝尚书先生的《论文学的东西差异》一文，立足中国古代文学中经常论及的文学南北差异（诸如王鸣盛《蛾术编》卷二《南北学尚不同》、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对南宋文学的东西差异进行了研究，提出“南宋四川与东南部地区，在文学内涵、文风及体裁、

① 在明清人的观念中，“关中”基本与“陕西”同义，康海曾云：“己卯乡试。提学大复何子景明试竣西归。语余曰：‘关中吾得二人，陇州阎倬、延安董珊，子幸识之，后关中称名士者必二人也’。”此处之“陇州”、“延安”分别在今之甘肃、陕北。明代陕西布政使司（陕西行省）自洪武二年（1369）初置以来，共领八府，分别是西安、凤翔、汉中、延安、庆阳、平凉、巩昌、临洮。清代康熙六年（1667）陕甘分省始，至光绪元年（1875）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奏请完全分离。1929年，民国政府又从甘肃分出青海和宁夏两省区。本书之“关中”沿用明清人之观念。

② [美] C. 恩伯、M. 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